

謝善元著

李觀之生平及思想

馬揚舫芳題

B2
X4

書
局

謝善元 著

李觀之生平及思想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王國軒

李贄之生平及思想

LIGOU ZHI SHENGPING JI SIXIANG

謝善元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 1/8 印張·1 頁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2900 冊

統一書號：2018·296 定價：3.50 元

ISBN 7—101—00044—4/B·8

中文版序言

《李觀之生平及思想》（以下簡稱「李著」）是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書時用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論文於一九七二年殺青，七年後，由美國舊金山的中國資料中心斥資出版成書〔一〕。

我本來並未想到要把我自己的書由英文再譯成中文，因為我近年來的研究興趣已逐漸擴充到先秦諸子與希臘古哲（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比較。可是，有一次與老友偶談，突然觸發了翻譯的興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我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去找陳鼓應教授〔二〕，告訴他一些我自己讀他《老子今注今譯》之後的感想〔三〕，他忽然提議我譯我自己的書。我當時聽了也還不十分動心。及至他從加大圖書館把《四部叢刊》本的《李直講文集》和中華書局出的《李觀集》〔四〕借出來讓我作翻譯時的參考，我纔下定決心做翻譯工作。

我下定決心時有幾項考慮的因素。第一，王國軒君為《李觀集》所寫的十四頁前言，提綱挈領地為讀者勾畫出李觀的經濟、政治、哲學、法學與軍事思想，當然是一大幫助；他為全集注上標點符號，更是一大貢獻；可是，對於一般想瞭解李觀生平與思想全貌的人來說，這些幫助和貢獻畢竟還嫌不夠。我的「李著」可以為這些位讀者省下許多寶貴的時間。如果有人願意替李觀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李著」無疑是一塊不可缺少的踏腳石。第二，「李著」雖然不是一本卓然成一家言的傳世之作，它畢竟

也花了我兩年多時間纔寫完。我在寫「李著」時的心路歷程，也許可以作為一些年輕學子研究寫書時的參考資料。如果我走過的路值得模仿，則年輕一輩的可以立即跟進，以便縮短學習時間；如果我走的路太迂迴曲折，不宜如法泡製，則年輕學子也可借為殷鑒，少走一些冤枉路。第三，「李觀集」第一次便印刷了近七千本。這表示說大陸上可能有幾千位讀者對李觀的思想有興趣。「李著」是用現代白話譯成的，又是瞭解李觀生平及思想的一把鑰匙，因此很可能會對這幾千位讀者起一點吸引作用。在這一點上，我和鼓應的看法是一致的。

以下我想把我的寫作過程簡單地報告一下。

一、選題經過

我是臺灣東海大學政治系第一屆畢業生^[1]，於一九五九年取得學士學位。服完兵役，又做了兩年事，我考取了美國傅爾布萊的全額獎學金，渡海到芝加哥大學，進研究院政治系，攻讀公共行政。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轉入東方語言及文化系^[2]，三年後，修完了必修課，通過了日文和法文測驗，考完了博士學位預試，隨即應聘到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執教。一九六八年春天，趁着教書之餘畧有空閒，馬上到多大的東亞圖書館去翻閱宋朝人所留下來的許多文集，以便確定寫論文的資料。當時芝大對博士論文的規定是：論文必須是一種新穎的、不落故套的知識貢獻，因此，論文的題目不但必須對我自己有吸引力，同時必須是別人尚未寫過的題目，或雖經別人寫過，而自己還能更上一層樓，提出超越的見解來。我在多大東亞圖書館摸索了幾個星期，翻閱了好幾十部宋人寫的文集，先後提出

三名不同人選，結果前兩名都被論文指導教授柯睿格〔七〕否決了；最後提出李觀，他纔舉起綠燈來，表示通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請到芝大的研究費，全力寫論文，把李觀的生平事迹及他大部份著作的裏裏外外都給整理了出來，可是我馬上遭遇到無法繼續寫作的困難。李觀的思想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它是李觀當時所處環境下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有歷史上縱的傳承和連繫。如果我想追根究底地闡述及分析李觀的思想，我必須先對宋朝開國以來的大事以及對李觀的同時期人物作點研究，並且要翻讀李觀在他著作裏所常提起的諸子的全集。這兩項都是很吃重的工作，決非我一邊教書，一邊寫作的方式所能應付〔八〕。一九六九年秋天，我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寫博士論文的獎學金，僥倖獲得〔九〕，遂於一九七〇年夏天返回芝大，全力寫作。

回到芝大後，我把先秦諸子的著作一部一部地看完，又挑中了揚雄、文中子、韓愈及柳宗元作為重點比較的對象。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考》幫助我理清宋朝大事，而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則是我寫有關李觀生平各事時宋朝歷史背景的主要參考資料。王安石的《臨川先生文集》成為我比較李觀與王安石的思想同異的重要根據。

二、寫作過程

一九七〇年的整個夏天都是在書堆裏磨過去的。我每天至少看十個小時以上的書。這種生活當然不免單調，可是，回想起來，這一段準備工作似乎構成了我的思想成熟過程中的一個大轉捩點。我對先秦諸子的種種學說，總算有點「得窺全豹」的感覺和滿足。同時，我對荀子的縝密思辨能力，也獲

得了深刻的印象（10）。

讀完先秦諸子的著作後，我開始抽選儒法兩家的思想要點，構成一個「概念間架」（Conceptual Framework）。這一個間架不但要能勾劃出儒法兩家思想的同異，而且要能用來評判李觀的學習能力與貢獻。他真的把儒家思想的精華學到手了嗎？他能不能衝破前人的框框，「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他有没有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如果有，又到什麼程度？

寫完先秦諸子那一部份以後，我又大畧地從漢朝到北宋選出幾位傑出的思想家拿來和李觀作比較。與他們相比，李觀能超越他們嗎？能跟他們並肩而立嗎？還是比他們遜色？當然，這一部份是極不完整的，而且很可能會發生掛一漏萬的情形。但除非我願意多花幾年功夫下去研究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思想家的所有著作，選些有代表性的樣品來作比較，恐怕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我當時也十分瞭解，如果我能把李觀的思想與宋朝的許多理學家作一個有系統的比較，一定會很有意思。李觀與張載、周敦頤、二程、朱熹以及陸王相比，他會處在何種地位？可是，要徹底做好這一步工作，也是我的學力和時間所不容許的。

因此，在許多條件的限制下，我自己作了一個戰畧性的決定。胡適及巴拉徐（二）都曾聲稱李觀的思想是王安石的先驅，我何不追踪這一線索，把他們的思想作一個徹底的研究與比較？他們之間是否經人介紹過而彼此認識？如果有，則介紹人又可能是誰？我花了好幾個星期在《臨川先生文集》及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裏打轉，結果找到許多前人未發現的結論。我自己的喜悅是不待言的。

資料找「全」以後，我又開始動「筆」。每天早上，我從住所趕到芝大新蓋好的圖書館裏，坐在一堆的資料前，開始用打字機把我的結論整理出來。可是，資料雖「全」，我每天平均却只能打一頁，因為每一句話都得有出處，而所有出處又得一個一個注明。由於英文對我來說是外國語，我又必須找好幾種字典來推敲所用各字的意義，並斟酌排字遣句的方法。幸虧那時候我的一位美國籍好友費馬克（Michael Finegan）剛從臺灣留學回來，願意潤飾我的英文，從而使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馬克不但讀過改過我論文的每一章，而且還提出一些歷史上的問題來，這對於改進我論文的質量來說，確有幫助，功不可沒。

三、「李著」的用途

我相信所有曾做過翻譯工作的人都會瞭解翻譯的難處。中文和英文句法不同，如果逐字逐句地譯，不但主要意思可能會被遮掩掉，譯文很可能生硬到令人無法卒讀。因此我譯「李著」時將以意譯為主。好在是自己的書，不會構成「是否對原作者忠實」的問題。

「李著」中當然有一些可以滿足讀者求知欲的資料。由於我所用的材料大多數是第一手資料，我的結論多半是別人還未接觸過的。李觀在世時的時代背景如何？為何他的一生總是有許多坎坷？他的主要著作裏以何者最有價值？他對儒家思想有何重大貢獻？他為何會對法家思想有濃厚興趣？他批評宋朝朝政有何突出地方？他和王安石相比優劣如何？他和王安石見過面嗎？他們有共同都相識的朋友嗎？這許多問題都可以在「李著」裏找到答案。

可是，「李著」對年輕學子的最大啓發，不在於發掘並整理一些歷史資料，而在於介紹一種思考的方式。

我在芝大上課讀書，前後整整五年（不包括寫論文的時間）。這期間，我無論讀書或聽講都很用功。我當時的感覺是：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善於整理史料，可是不長於推論，因此做學問時顯得瑣碎；歐美學者長於邏輯性推論，可是，由於文字上的隔閡，從事漢學研究時，常嫌有天馬行空之病——不夠紮實。因此，中國及日本的漢學家若想蜚聲國際，必須多在概念思考（Conceptual Thinking）上面下功夫；而歐美籍的漢學家若想獲得中國學者的尊敬，也必須在文字學上多磨練幾年。後者不在本序討論之列，前者似有再加闡述的必要。

所謂概念思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透過類的觀念，把發生在同一類的分子上的事，提升到類的層次來討論。能如此，則發生在許多許多個體上的個別事件，纔能逐步和抽象層次較高的主題掛鉤。譬如說，張三在一家工廠裏做工。某一個星期三，他因為頭痛，沒去上班。他的工頭因此扣了他一天薪水。和張三在同一工廠裏做工的李四和王五聽到這件事後，非常憤慨。這一件事，如果用概念思考的方法來處理，則張三便是工人的一份子，星期三是工作天中的一天，頭痛是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適，工頭是行政上長官，扣薪是行政處罰，憤慨是情緒上的激動。我們現在可提的問題是：「工人在工作天因生理或心理上不適而無法履行他職務時，其行政長官是否可作任何行政處分？這種處分是否有法令上根據，還是可依行政長官任意決定？」等等。如果我們沒有概念思考的習慣，則我們很可能一

直在「張三」「星期三」「頭痛」「扣薪」這些具體名詞中打轉而跳不出來。

我寫「李著」第五章時，便曾一再應用概念思考的方法。這可以從該章的幾個小標題中看到一些端倪，而在各節作總結性評論時最爲明顯。這當然不是作學問或寫書的唯一方法，可是，我個人覺得這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道路。

我對「李著」的介紹到此爲止，希望讀者們在看完本書後，不但對李觀的生平與思想有進一步的瞭解，更對自己的思考、研究與寫作的能力有幫助。果能如此，則我自翻自譯、自拉自唱的一番努力，便算有了代價。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寫於美國加州

[1] Shan-yüan Hsieh,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i Kuo*, 109—1059.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9.

[二] 陳鼓應是前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對老子和莊子的哲學很有研究，曾參考古今各家注釋，著成《老子今注今譯》及《莊子今注今譯》兩種書。一九七九年，他應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中國研究中心之邀，到美國來作研究。

[三] 我利用電腦處理了我對陳鼓應的《老子今注今譯》及張松如的《老子校讀》兩書的讀後感，準備寫一篇書評。我那天去陳家，便是把我處理陳著的電腦資料帶給他看，並請他批評。

[四] 《李觀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一年。

[五] 東海大學位於臺灣省臺中市西郊大度山，創立於一九五五年。它最初是由美國基督教聯合董事會撥款支

持的，近年來，它的財政已完全獨立。

〔x〕由於沒有打好底子，我讀美國公共行政理論時，成績平平。與兩位教授討論後，決定轉系，以便用我本身所長。

〔y〕我最初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哈特威爾(Robert Hartweil)。可是他沒有拿到芝大的永久聘留(tenure)，六七年夏天應賓夕凡尼亞大學之邀到費城(Philadelphia)去教書。於是我改請柯睿格教授(Edward A. Kracke, Jr.)擔任指導教授。柯教授早年曾到北京留學，中文根基甚好，對宋朝的文物制度尤其熟悉，曾著《宋初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六十年代的柯教授，是美國首席宋學權威。

〔z〕一九六八年底，我獲得加拿大貴賓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政治系和歷史系的聘書，答應於一九六九年一月開始到該校執教。第一學期只開兩門課，以便趕寫論文。從夏天開始，改為全額教學。

〔aa〕這一份獎學金是由加拿大評議會(Canada Council)給的，為期一年。一九七一年夏天又延了一季。沒有這筆獎學金，我的論文可能又得拖很久纔會完工。

〔ab〕一九七三年夏天，我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寫了一篇《荀子的政治哲學》，登在《中國哲學學報》上。Shan-yüan Hsieh, "Hsün Tzu'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6 (1979) 69—90。

〔ac〕Etienne Balazs 是一位很有名的漢學家。他於一九〇五年生於匈牙利。稍長在德國和法國受教育。他曾研究唐朝經濟史和後漢思想史，最後對中國的官僚制度有興趣，認為可由此確切地瞭解人類文明。他最後在巴黎大學執教，卒於一九六三年。

英文版致謝辭

在一個人的漫長的智力成熟過程中，最先跨出的一大步（寫一本書），常常是最最困難的。其中原因不難揣摩——他必須先作個調查，看看他的研究計劃是否已經有人領先着鞭；他必須肯定他的研究項目是有意義的；他得把他的工作徹底做好；他必須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這些不但要花他自己許多時間和精力，通常也需要別人不斷幫助。

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寫於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間）改寫而成的。在那四年中間，我很幸運地能夠獲得故柯睿格教授親自指導。他幫我選定了論文題目；不辭勞苦地閱讀我論文中的每一個句子甚至每一個字；並且提出了許許多多問題來問我。他之所以如此做，其目的正在於希望我能透過解答他的各種問題而提高我的論文水平——雖然我的論文不至於好到無懈可擊，至少也不至於落到不堪一擊。平心而論，如果我不曾獲得他那麼多指導，我很可能寫不完那本論文。

芝加哥大學的其他兩位教授——顧立雅及錢承訓教授——曾親切地閱讀我的論文初稿，並給我許多寶貴的批評。另一位芝大教授——鄭謙教授——在我寫論文的第一階段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我把李觀和中國史上著名思想家貫聯在一起討論，便是由鄭教授提示的。）費馬克君（我在芝大讀書時的室友），在他一九七二年赴日之前，曾閱讀我手稿中的每一個字，並曾為我小心潤飾英文。我對上

述幾位師友，表示衷心感激。

中國資料中心的負責人艾立克博士，是我透過丹佛大學的同事（孫立哲博士）的介紹而認識的。他看過我的論文以後，決心把它出版成書，賺錢與否，在所不計。這是一個很有魄力的決定。他又根據他的讀後感，對我的論文提出許多重要建議。我對他也是誠心誠意地感激的。

最後，我要向我自己的岳母——馬楊嗣芳女士——致以衷的謝意。她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曾在臺北的一次書法比賽中獲得首獎。她肯俯從我的請求，答應為我的書題字，使書增色不少。

當然，這本書裏若有任何錯誤，我要負全部責任，與上述諸君女士一概無涉。

目 錄

中文版序言	一
第一章 導 言	一
第二章 歷史背景	六
第三章 李 觀 傳	一三
第四章 李觀的著作	六一
第五章 折衷持論的政治思想家	八三
第六章 傳統儒家政治理論的精鍊者	一〇七
第七章 社會批評家	一二六
第八章 李觀與王安石	一五六
第九章 結 論	一九九
附 錄 參考書目	二〇六
後記	二二三

第一章 導 言

我在一九六八年決定選宋朝的李觀（一〇〇九——一〇五九）作爲我論文的中心人物時，已經有好幾位學者對李觀的著作表示過興趣了。胡適恐怕是近代第一位爲李觀的思想寫長篇文章的中國學者。他那篇文章定稿於一九二二年，其中指出李觀與王安石的思想有相通處〔一〕。接着，巴拉徐教授在一九三三年用德文寫了一篇文章，把李觀——王安石的先驅——介紹給歐洲的讀者〔二〕。日本學者也有對李觀有興趣的，其中至少有三位曾撰寫文章討論過他〔三〕。在這三篇文章裏，最令人拍案叫好的是本田濟所寫的那篇，因爲他曾對李觀的著作做了一番正確的批判和評價〔四〕。

可是右述諸君都不曾爲李觀的生平和思想做一番徹底的研究。有鑒於此，我於是決定分析他的整部文集〔五〕，而分析的結果，是出版了本書。

我在寫書時所用的研究方法、步驟以及術語，都是因襲常規的〔六〕。第二章交待了宋朝開國以後七十年間的社會概況，以便讀者能瞭解李觀是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中出生以及長大的。第三章勾描出李觀的生平大事。第四章順着年代討論了李觀的重要作品。我不但推斷了各種著作的發青年月，介紹了它們的主要內容，也討論了它們在李觀一生寫作中的意義與份量。

第五至第七章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我在這裏從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察看李觀的各種觀點。第五章

比較了李觀對各種政治問題的看法以及同先秦諸子的哲學異同。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李觀自稱他曾熟讀過中國先哲的書。把兩者相比可以讓我們瞭解李觀到底從他們那裏承襲了多少。由於我無法找到一個現成而又合乎我需要的參考問架，因此我就特地為這一章建立了這麼一個問架。我在建築過程中閱讀了《論語》、《孟子》、《荀子》、《商君書》以及《韓非子》，因為這些書是李觀政治思想的主要來源。第六章探討了李觀對儒家哲學系統的貢獻。（李觀的貢獻主要在於德與智這兩方面的學說。）第七章審視了他對當時社會上各種問題的批評。我在這一章裏所用的小標題，諸如政治、軍事、經濟、財政以及社會等等都是常用的類詞。不過這些類別似乎挺管用的。另一方面，這些類別幫助了李觀與王安石之間的政治思想的比較。這一個比較是第八章的主要課題。

至少有兩位學者曾聲稱李觀是王安石的先驅。可惜他們不曾細細比較李、王之間思想的異同。其次，迄今無人能斷言是否李玉王兩人曾經邂逅相識。本書第八章為李玉王兩人的思想作了一個有系統的比較。（我所用的類別，就是原來分析李觀生平與思想時所用的類別），同時衡量了介紹他們兩人相會或相識的幾種可能情形。我的結論是：李觀曾對儒家的哲學思想起了提升和精鍊作用，而王安石沒有。可是王安石對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瞭解並不比李觀差。作為時政的批評者，李玉王兩人是不相伯仲的。然而他們的政治命運却大異其趣。李觀一直沒有機會擔任政府公職。晚年雖然得到一官半職，這職位也低微得可憐；反觀王安石，却有得君寵、施抱負的千載難逢良機。我無法確定李玉王兩人是否曾相見相識，可是我深信，他們兩人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而他們之所以能相識，是因為

他們兩人有共同的朋友——祖無擇。

本書的主題是一位北宋學者的生平與政治思想，可是，書裏也觸及一些理論性的問題。這些我在結論章有些交待。

不消說，宋代思潮裏有其他許多層面可能與李觀的政治思想有關。第一個值得提出的問題是：李觀與宋朝幾位知名的理學家之間有何淵源或連繫？我的印象是：李觀很少涉及形而上學的問題（二）。他和當時的幾位知名的理學家諸如邵雍（一〇一一至一〇七七七年），周敦頤（一〇一七至一一〇七三年），張載（一一〇二至一一〇七七年），程顥（一一〇三至一一〇八五年）或程頤（一一〇三至一一〇七年），似乎沒有來往。李觀在飽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那段時期裏，並沒有跳出當時儒學傳統的範疇。他的主要興趣，顯然只在於與宋朝當時政治問題有關的那些思想命題。在這方面，他和王安石是極類似的。兩者都是從實用觀點取向的。

我在寫書過程中所用的資料當然是不完整的。不過我已經盡力選擇——選擇那些能够代表中國思想主流及能代表宋朝歷史背景的資料。如前所述，我用了先秦諸子中五子的著作，也用了《周禮》以及李觀、王安石、韓愈（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柳宗元（七七三至八一九年）的文集。有關宋朝開國以後五十年內的大事，我用的材料主要來自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以及李準的《皇宋十朝綱要》。一〇九至一一〇四一年間的歷史材料，大部份採自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與李觀同時期的許多其他北宋人物的文集當然可能會幫助我們瞭解十一世紀上半葉的社會與政治情況。可是，爲了使我的